

韦皋《大像记》三碑的碑文

于树德

唐人韦皋《大像记》，是其所撰《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》一文的省称。该文曾先后三次镌刻于碑：最早镌刻的是唐德宗贞元19年（公元803年）在嘉州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上的韦皋“摩崖碑”，接着是位于凌云寺门镌刻于明宪宗成化17年（1481年）的魏瀚“立石碑”，然后是镌刻于1945年位于凌云寺天王殿外左侧遍能所书的“嵌壁碑”。就其间的关系看，韦皋“摩崖碑”是源，魏瀚“立石碑”和遍能“嵌壁碑”则是流，但因种种缘由它们在文字上却有一些差别。本文拟就三碑的碑文及其差别作最初步的考察。

韦皋“摩崖碑”是大弥勒石像（即乐山大佛）建成时为“爰记本末，用昭厥功”而依伴山崖镌刻的。从南北朝时起，佛教石窟造像开始出现题记，以介绍凿建时间、佛像名号甚至供养人名。后来又演变为刻碑记事。“其题字之制：摩崖刻者，凿石为龕，题字皆在龕之上下左右。……若特建大象，而别立碑以记之”（朱剑心《金石学·说石》）。韦皋《大像记》摩崖碑正是承袭这种时俗风尚，出于表彰开凿大佛的壮举而制作的。

韦皋碑是一通形制雄伟且具唐代典型风格的摩崖石碑。它镌刻在乐山大佛右侧的临江峭壁之上。从碑盖为卧龙高浮雕造型看，它最初可能为“螭首龟趺”的石碑，只是因年代久远，底部的龟趺已完全毁损。它高达6.6米，宽有3.8米，碑面约25平方米，为一硕大无朋的巨型碑刻。碑文排列共25行，其中多数为34字，

有三行为36字，最少的一行为28字，加上附列题记全文有850余字。碑文的字体，除个别为行书外，均为唐代盛行的真书，笔意疏朗、庄重、典雅，与其时颜真卿《多宝塔》等碑字体的风格近似。

韦皋碑的碑文，因近1200年的风雨剥蚀，已严重漫漶而难于识读。但经文物工作者近期对其碑版照片进行细心辨认，并参照万历《嘉定州志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、同治《嘉定府志》等所载碑文校补，现已将原碑碑文弄清。今据《乐山史志资料》1991——1992年合刊中毛西旁所校勘的碑文，转录于下：

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

惟圣立教，惟贤启圣，用大而利博，功成而化神。即于空，开尘劫之迷；垂其像，济天下之险。嘉州凌云寺弥勒石像，可以观其旨也。神用潜运，风涛密移，舂蠡幽晦，孰原其故？在昔岷江，没日漂山，东至犍为，与凉山斗。突怒哮吼，雷霆百里。索缴触崖，荡为廛空。舟随波去，人亦不存。惟蜀雄都，控引吴楚。痛兹沦溺，日月继及。开元初，有沙门海通者，哀此习险，厥惟天难，克其能仁，回彼造物。以此山淙流激湍，峭壁万仞，谓石可改而下，江或积而平。若广开慈容，廓轮相，善因可作，众力可集。由是崇未来因，作弥勒像，俾前劫后劫，修之无穷。于是，规广长，图坚久，顶围百尺，目广二丈，其余相好，一以称之。民惟子来，财则檀施。江湖淮海，珍货毕至。债师金工，亦无不臻。于是，人夫竞力，千锤齐奋。大石雷坠，伏螭潜骇；巨谷将盈，水怪易空。时积日竞，月将岁就，不数载而圣容俨然。茗茗亭亭，岌岌青冥，如现大身，满虚空界。惊流怒涛，险自砥平。萧萧空山，寂照烟月。由内及外，观心类境，则八风澄而爱河静也。余以为人之生也，

违道而好径，故哲圣因其所欲，示之以进修，其行满于此而福应在彼，理甚昭矣。至夺天险以慈力，易暴浪为安流，何哉？详彼万缘，本生于妄，知妄本寂，万缘皆空。空有尚无，险夷焉在？至圣寂照，非空非有，随感则应，唯诚浅深，化于无源，奚有不变？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平斯险也。彼海上人发诚之至，救物之宏。时有郡吏，将求贿于禅师，师曰：“自目可剜，佛财难得。”吏发怒曰：“尝试将来！”师乃自抉其目，捧盘致之。吏因大惊，奔走祈悔。夫专诚一意，至忘其身，虽回山转日可也。况弘我圣道，励兹群心，安彼暴流，俾其宁息，其应速宜矣。而功巨用广，其费亿万金，全身未毕，禅师去世。于戏！力善归仁，为可继也。其后有连帅章仇兼琼者，持俸银二十万，以济其费。开元中，诏赐麻盐之税，实资修营。事感天人，克遵前志。谅禅师经始之谋大，虑终之智朗。苟利物以便人，期亿劫以同济。贞元初，天子命我守兹坤隅。乃谋匠石，筹厥庸。从莲花座上至于滕，功未就者几乎百尺。贞元五年，有诏郡国伽蓝，修旧起废。遂命工徒，以俸钱五十万佐其费。或丹彩以章之，或金宝以严之。至今十九年，而趺足成形，莲花出水，如自天降，如从地涌。象设备矣，相好具矣。爰记本末，用昭厥功。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五日，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 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中书令 成都尹 上柱国 南康郡王韦皋记。

随带知表记登仕郎 守蕲州苏祁县令

赏绯鱼袋张綽书并篆额

节度衙前逐要许□□□（督刊）

韦皋的碑记在两宋时已广为流传。最先得到传播的可能是

“碑目”。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出任嘉州知州的吕昌明，撰有详于人文历史的《嘉州志》二卷，其只能录目是显而易见的。同时，有刘涇著录府县碑版幢柱撰成《成都刻石总目》，据书题可知其内容也在于录目。接着才有碑文的拓本传世。据南宋周辉《清波杂志》记载，其时有郑暘集荆、襄、川、蜀金石刻文的《五路墨宝》传世，篇幅达数巨册，韦皋的《大像记》碑文当在其中。两宋间高邮人张邦基撰《墨庄漫录》卷三所记：“《嘉州凌云寺大像记》，韦皋文，张绰书，其碑甚丰，字画雄伟，顷于潘义荣处见之”，说明该碑记拓本已在江淮地区流传。

魏瀚“立石碑”的镌刻，自有其历史的渊源。首先是唐韦皋碑的湮没无闻。“宋元之际，（嘉定）城北麻坪，三龟九顶，兵祸延绵”（黄熔《民国乐山县志·序》），导致佛阁与九曲栈道的塌毁，接着就是岩畔荆棘藤蔓的渐次丛生而将韦皋碑湮没。其次是“使禅学者能咏游于慈云慧日之下”的需要。（尹东郊《重新凌云寺记》）在明代，随着佛教徒朝拜名山风气的发展，自当赋予凌云山以特殊的意义，而人们由此要求了解大佛建造宗旨与开凿经过也属自然，于是翻刻韦皋《大像记》就显得非常必要了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注重文治教化的魏瀚出任嘉定知州，他根据两宋以来广泛流传的韦皋碑文拓本翻刻了《大像记》碑。

因魏瀚碑现已不存，其基本情况除依文献能查考一些外，余皆不得而知。它的位置，嘉庆《乐山县志》的“今寺门所立，乃明州牧魏瀚所建”的记述指明了所在，而清乾隆进士张洲《游凌云记》的从凌云山门“东折见韦南康大像碑”则具体说明是在今天王殿外空坝中。它的字体，据该碑首行别体另书“随带知表记登仕郎守嵩州苏祁县令赏绯鱼袋张绰原书并篆额”的记载，以及碑末题记中“寺僧修中缮录”的文字，可以看作是原碑的仿写。只是碑体不可能象原碑硕大，其字径及字行等自然将按比例缩小。

根据原碑拓本翻刻的魏瀚碑，其文字内容按理说应与韦皋碑一致，可是经与原碑“碑版照片”对照却发现了一些较明显的差别。首先是篆额碑题的不同：韦皋原碑题为《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》，魏瀚碑题则为《嘉州凌云寺大像记》，省略了“弥勒石”三个字。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，可能是沿袭宋人就这个碑题“省写”的习惯。《墨庄漫录》的《嘉州凌云寺大像记》，《輿地纪胜》中的“韦南康大像碑”，《方輿胜览》中的“皋有大像记”等的记述，都说明了“省写”的相沿成习。魏瀚碑翻刻时，受这种习惯的影响，将碑题作上述变动就很自然了。不过，因其依据的是原碑的拓本，要说这种变动还具有某种意念上的缘由，显然也是存在的。对此，只好结合下文来进行探讨了。

其次是魏瀚碑将原碑中的“弥勒”改成为“古佛”的变动。韦皋碑中的“弥勒石像”和“作弥勒像”文字，魏瀚碑则镌刻为“古佛石像”和“作古佛像”。这个变动，从佛教造像角度看是允许的，因为作为未来佛弥勒像的造型，在基本的方面是仿照现在佛释迦牟尼的形象来塑造的，故将其称作“古佛”在形象上是可以的。但这里关注的是它为什么要改动？因为韦皋碑拓本保持的是“原样”，而这里的改动则无疑是有意为之。问题看来就出在被改变了的“弥勒”二字上。在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时，未来佛弥勒是为解决将来会怎么样的问题而产生的。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，随着《弥勒经》的传播，弥勒下生人间带来幸福和光明的观念不胫而走，于是它成了一尊象征人间改朝换代的佛像。元末红巾军徐寿辉部就是举着弥勒的旗帜举事的，其所辖明玉珍一支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时就明确提出了要奉行“去释老二教，止奉弥勒”的政策。明二奉明玉珍令进攻“屯嘉定之大佛寺”的元军时，因相持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，他们推崇弥勒的信仰又与乐山大佛的宗教内容相一致，这自然会将这尊招惹是非的佛像的影响扩散到民间。时过境迁，一方面适应明代前期佛教徒游方学道

的需要而必须重刻《大像记》碑，另一方面为消除其招惹是非的影响而将其有关文字修改，于是“弥勒”改“古佛”的情况就出现了。由此不难看出，碑题的差别，实际上也包含着这样的内容，只是它能以相沿成习的省写来掩盖罢了。

再次是韦皋官职的称谓，原碑记作“云南安抚”的地方，在魏瀚碑中却变成了“南安巡抚”的字样。“南安”为古代乐山第一个史载地名，系战国时秦国灭蜀后在其地置县，希望当时南部边陲能永远安定而定的名。“巡抚”之官职，唐代时尚未设置，明太祖时曾临时短期任命，直到明仁宗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才正式设为专职官员，故要将其作为韦皋官职之一自然是一个错误。当时负责缮录的凌云寺僧修中，是奉命而改或不慎误记已无从查考，但因此却留下了明人刻碑的痕迹。

魏瀚碑末尾的题记，除将原碑的“张绰书并篆额”提前列于首行和“节度衙前逐要许”加以删除之外，按翻刻时参与其事的情况增补了以下的文字：

赐进士 前监察御史 嘉定州知州
权广东雷州知府 余姚 魏 瀚
同知 邓 清
州判 潘 谦
吏目 赵 禧
赐进士监察御史 擢云南按察司副使
郡人 刘 肃
大明龙集成化十七年岁在辛丑秋七月
望日 僧正司 常真立石
寺 僧 修中缮录

魏瀚碑的碑文，在明清时期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它吸引着许许多多前往凌云山的旅游者，并被多次收入省、州、县志之中。在民国《乐山县志》中尚记有：“今寺门所立，乃明州牧魏瀚所

建”的文句，这说明它经过四百多个春秋，一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依然存在。可能就在那一段时期，由于凌云寺不时有国民党军队进驻，因移作他用而导致该碑毁灭。

遍能所书的“嵌壁碑”是为了适应人们要求了解大佛历史文化意义的愿望而镌刻的。遍能为当代高僧，他博览经史，佛学造诣颇深，精通古代诗文，书法独具一格。1945年时，他应凌云寺住持果静之请，将《大像记》补书镌刻嵌置于该寺天王殿外左侧墙壁上，于是关于《大像记》的第三通碑便产生了。其碑文来源就是魏瀚碑在方志中的抄印件，只是由于辗转传抄而在文字上小有出入，如将“立教”写作“设教”、“尘劫”写作“尘刹”、“不存”写作“不予”、“痛兹”写作“建兹”等等。在形体方面，它为横置的长方形碑，碑面约在二至三平方米之间，状如核桃大的文字竖行从右向左排列。尽管该碑碑面不大，字径较小，但因字迹工整，笔意刚劲，再加石碑嵌于墙壁上中人等高处，游人阅览甚为方便。故在近半个世纪里，它一直深得人们的喜爱。

《大像记》之所以再三镌刻，显然同其记述大佛凿像缘起与造像经过的内容有关。可惜的是，由于采访不周，《全唐文》、《全蜀艺文志》和《文苑英华》等集部书籍皆未收录，甚至连一些著名的金石著述（如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与清王昶《金石萃编》）也暂付阙如。近年该文虽已收入高文等编《四川历代碑刻》一书，但其“文录”内容所据仍为魏瀚碑记，正如前述这与原碑仍有重要差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将原碑碑文的近期研究成果公之于众，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乐山教育学院